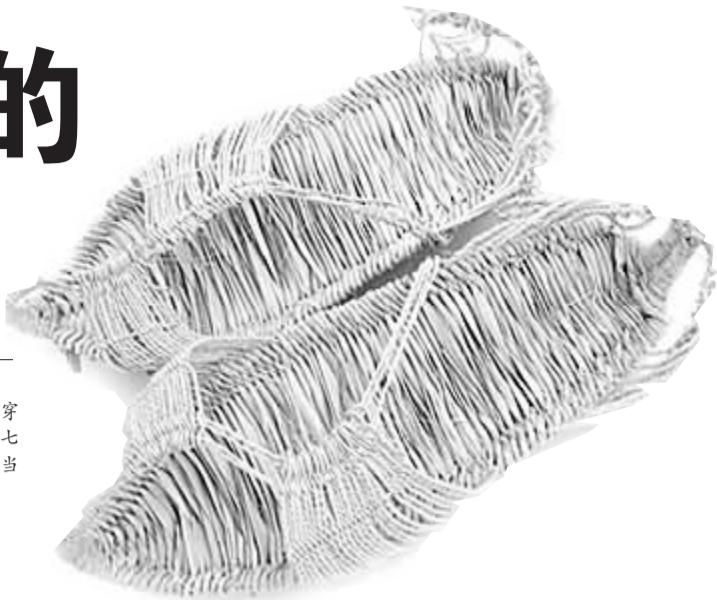


草鞋匠：裹足御寒的草根技艺

□晚报记者 朱保彰

草鞋匠，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打制草鞋的人。草鞋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，在远古社会，人们尚未发明鞋子之时，穿的都是用草编织的鞋子。随着布鞋的产生，人们就很少穿草鞋了。草鞋在我们豫东地区主要是在冬季御寒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都知道，草鞋是冬季踏雨雪、防足冻的一种鞋子，至今在农村偶尔能看到，在城镇很难见其踪迹了。当然，草鞋匠的身影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

制草鞋是个苦力活

前不久，记者通过走访寻找到一位草鞋匠，至今他仍在编织草鞋，他的客户主要是上了年纪的人。这个草鞋匠叫刘大寨，居住在沈丘县白集镇张庄村，从事草鞋编织已经有30多年了。

谈起自己从事草鞋编织的经历，刘大寨感慨颇多。按他的话说，是苦难的生活造就了自己的草鞋编技艺。在生产队的时代里，农村不少人常年赤脚行走和劳动，能穿上草鞋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，所以许多人冬闲时都要打草鞋。草鞋匠靠打草鞋卖贴补家用、维持生计。刘大寨在成年后跟村里的老草鞋匠学编织草鞋，他仅用了几年时间就成为村里小有名气的草鞋匠。

刘大寨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，当时的农村很贫穷。刘大寨跟随师傅学习草鞋编织技艺是在1962年大饥荒时期，当时人们刚刚从饥饿中走出来，穿衣穿鞋仅仅是为了遮羞、御寒。那时候在农村，人们一件衣服往往要穿一两年，夏秋季节几乎是光着脚干活。因为没钱买棉鞋穿，到了冬季人们都是穿草鞋过冬。即便如此，草鞋也不是人人都穿得起，有一定家庭的人才穿得起。草鞋的下半部是一块有两寸厚的木板，上面则是用芦苇穗子或者是稻草编织的鞋帮，有一定的防寒御寒效果，遇到雨雪天还能当胶鞋穿。

刘大寨说，编织草鞋一要靠眼力，二要靠能吃苦。打竹麻草鞋的工序很多，主要有

扭草鞋绳、备草、打草鞋，做鞋底等。其中做鞋底最难，它需要有木工的技艺，所以“技术含量”也最高。在编织草鞋有了一定的经验后，刘大寨发明了自己的草鞋工具：一个扭绳的竹架（用来扭草鞋绳）、一个草鞋架（主要结构近似农民耕田用的犁头）、两个木锤（大、小各一，大的用来锤击芦苇穗子和稻草，使其柔软，小的敲击鞋底、鞋耳、鞋帮，使其扎实平整）、竹梳子（编织草鞋时用来梳理绳子，挤压新编织的鞋底使纹路细密）。刘大寨说，编织草鞋只要不编散了就行，关键是要靠体力支撑，他在青壮年时，一天能编织20多双草鞋，一坐就是一天，腰不酸腿不疼。



资料图片

靠手艺赢得村民尊重

刘大寨说，当时一个公社有几十个草鞋匠，到后来就剩下十来个人。原因是啥，手艺要精！同样的草鞋，你编织的草鞋穿一两年就开帮子了，而人家编织出来的草鞋穿十年八年也不会散帮子，这就是技术。同样的材料，到了草鞋匠手里就能编织出不一样的质量，这就是技艺的高低之分。

刘大寨说编织草鞋要先从鞋尖开始，把芦苇穗子和稻草搓在一起，每编织二至三指宽就用木梳子挤一次。草鞋编成后，用小木锤反复敲打鞋的底、帮、耳，再用染色后的竹麻精心编织一些图案缀在草鞋尖子上，才算大功告成。刘大寨自豪地说，自己年轻时娶媳妇就是靠自己的好手艺。那时候他经常拉着架子车四处游乡给人编织草鞋，练就了一手好活计，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。想编织出优质草鞋，首先草鞋匠的心眼要好。刘大寨所编织的草鞋以材

料好、做工精、样式美、最耐穿著称，许多当地人以能穿上一双他打的竹麻草鞋为自豪。其实，那个年代编织一双草鞋只能卖两三块钱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卖到七八块钱，收益甚微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刘大寨喜欢传授草鞋工具的制作方法和打草鞋技术，像送草鞋一样，谁需要学习，只要他或家里人认为是好人，他都会无偿地传授。所以，当地不

少专业和业余草鞋匠都当过他的徒弟，他“发明”的草鞋工具逐渐在当地农村推广普及。改革开放后，村民们逐渐富裕起来了，人们都能穿上大头鞋、雪地靴、皮棉鞋等，刘大寨编织草鞋的绝活没有了“用武之地”，但他却一直珍藏着自己打草鞋的工具，偶尔还会给子孙孙女打双草鞋，让他们感受一下自己的技艺。靠编织草鞋来养家糊口的日子，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
张之洞爱读书与两官员的仕途兴废

■马斗全

官员因上司爱好而仕途兴废之事，古往今来皆不鲜见。张之洞也有兴趣爱好，爱读书求学问便是其中之一。

作为清季重要军政大臣，张之洞在近代史上还是一个著名的文人。他十六岁中举，步入仕途后，不管政务和军事多么繁忙，从不废读书求学问。清代巡抚一般都是有学问者，张之洞的学问又比一般巡抚要大得多。

其所著《书目答问》一书，为重要书目著作，至今仍受到当代学者的普遍重视，允为名著，广为人知。而他喜好读书并要求属下也多读书的事，人们知道的似乎并不多，这里讲他在山西劝读事。

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时，组织人员修《山西通志》，由府学教授杨筠总负其责，他自己也亲自参与。杨筠所藏有关金石资料中有“勾吴鉴”，又作“公吴鉴”，张之洞与杨筠都认为“勾”与“公”为声转通假字，但是却找不到依据。

有一个陕西人叫王纬，当时在山西当个拔贡出身的小官，还不知因何故被降职。这位王纬写信给张之洞，引《仪礼》郑注

“勾亦作公”为证。张之洞读信后知此人勤于读书而博学，非常高兴，便为他恢复原职。虽然两人地位悬殊，但张之洞视王纬为友，常常降贵屈尊去王纬那里倾谈。以致有些人不明真相，还以为王纬与张之洞是同窗呢。

光绪八年(1882年)山西乡试，身为巡抚的张之洞亲任监临。因为要在考场待一个月，便调王纬为收卷官，并让王纬再找一位博学者来做事，为的是谈学问，驱寂寥。王纬听说榆次县令吴某的爷爷是大学者袁枚的外孙，吴某又是知名文人潘文毅的女婿，心想这位吴某应是饱读诗书的人，便请了来。

谁知这位吴县令却是一个不读书的主儿，什么学问也没有，在考场一个月，像哑巴一样，一言不发。张之洞大为不快，讽劝他说：“你的老丈人把十万卷藏书送给朱九江，而不给你，其过在你，是因为你不读书！”

乡试结束后，张之洞不使吴某回榆次，而另调他职。吴某深愧当初不读书，要儿子一定刻苦读书。他的儿子后来学有所成，就是编撰《唐方镇年表》、《北宋经抚年表》和《南宋制抚年表》的历史学家吴廷燮。

伍廷芳与大隈重信等赌寿命

■沈淦

民国作家李定夷在其《民国趣史》中，有一篇《长老赌寿之佳话》，记载了中美日三个老人赌赛谁的寿命更长的故事。

美国社会学泰斗、俄古大学教授司达博士，经常赴日本旅游，与日本首相大隈伯(大隈重信)关系相当密切。有一天，大概是见司达一把年纪尚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太平洋两岸吧，大隈重信对司达说：“我看你身体非常健康，应该能享有高寿。”

司达颇为豪迈地说：“不错，我自信能够活到一百二十岁。”大隈重信哈哈大笑说：“可是，我却自信能够活到一百二十五岁呢！”司达不服气地说：“然而我与阁下究竟谁的寿命更长一些，今天尚属于未知之数，咱们就用此事来赌一赌，怎么样？”

大隈重信怎肯示弱，爽快地一口应允。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民国元老、广东新会人伍廷芳先生，其时正在当“卫生之实行家”，即做一些倡导国人讲究卫生的具体工作，他与司达博士也是老朋友了，司达就写信给他，希望他也加入这场赌寿比赛。

伍廷芳回信道：“听说阁下与大隈伯赌赛谁更长寿，这实在是一件雅人趣事。以阁下与大隈伯如此健康之体魄，又很注意卫

生，理所当然地都能享有高寿。不过，我伍某身体之健康，又远在你们两位之上，其寿命也必然比你们两位要长得多，他日必能从阁下与大隈伯的子孙手上领取赌金。请你们两位早作准备，在遗嘱中予以注明，伍某不胜欣幸。”

不知怎的，伍廷芳的这封信及赌寿的事儿，竟然传了出去，美日的新闻界都竞相报道。

《民国趣史》初版于1915年3月，书中说：“闻大隈伯今年七十八岁，伍廷芳今年七十二岁，司达博士年最少，才五十七岁云。”伍廷芳生于1842年7月30日，李定夷写此文时伍廷芳72岁，即1914年。而大隈重信生于1838年3月11日，1914年应为76岁，而非78岁。

至于57岁的“司达博士”究竟是谁，笔者尚未查出。因此，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，也无法判定三人中的最后胜利者。

有趣的是，大隈重信和伍廷芳都各有“高寿理论”。大隈重信在《人寿百岁以上》中曾详述过自己的“125岁理论”，但却病逝于1922年1月10日，享年83岁。而五个半月后的6月23日，“常自言能活至二百岁以外”的伍廷芳，亦一病而逝。按照中国人的算法，他虚龄81岁，而按西方的算法，却只有79岁。